



马永强 著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马永强 著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 马永强著 . - 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3.1
ISBN 7-81052-631-6

I . 文… II . 马… III . 现代文学 - 文学研究 -
中国 IV .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560 号

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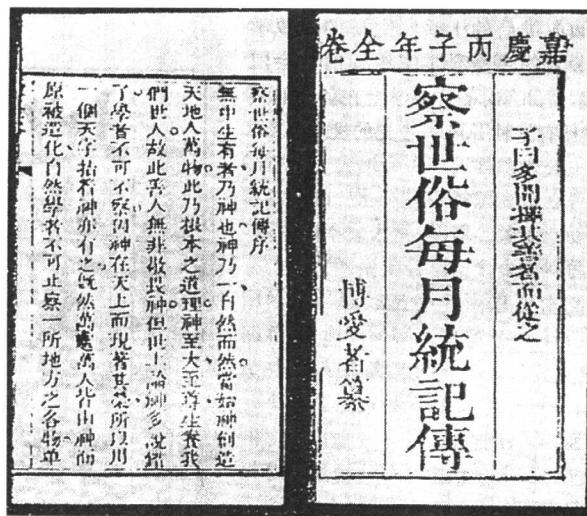
马永强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总编室 0551-5107719	开 本	850×1168 1/32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张	9.25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字 数	200 千
责任编辑	彭君华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52-631-6 / I·52

定 价 18.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1815年创办的中国第一份现代中文期刊《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维新变法时期的“公共舆论”形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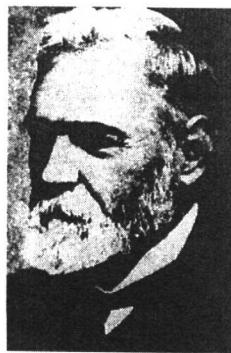


林纾翻译的三大文学名著



杂志三种

支持维新的英国传教士
李提摩太·宣传西学、



呈递的《新政策》
李提摩太向光緒皇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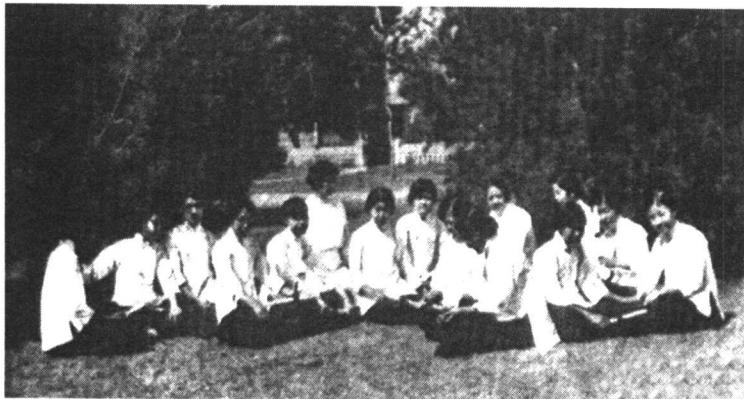




青年梁启超



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的
容闳（1828—1912）



民国初年北京教会学校的女大学生



夏瑞芳



鮑咸昌



高鳳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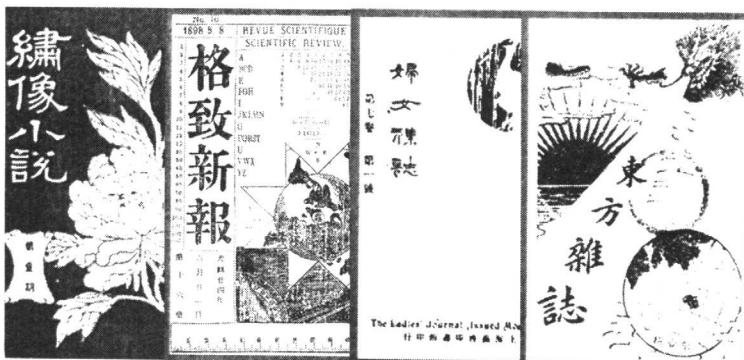


鮑咸恩



張元濟

商务印书馆的早期创业者



商务印书馆早期出版物

文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与格局的创制

——序《文化传播与现代中国文学》

马永强的这部著作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就受到了专家学者的一致好评。除了作者的严谨学风和清晰的逻辑表达外,最能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这个选题的新颖视角和作者在文学环境研究中的独特发见。

过去,我们只强调新文学发生和发展中的思想层面,也就是接受主体的研究,属于韦勒克说的那种内部研究。近年来从外部研究视角切入的文章和著作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像马永强这样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来大规模地论述两者之间看似简单却有千丝万缕内在联系的皇皇论著尚不多见。作为相对独立而平行的学科,新闻传播学和新文学是分属于两个俨然不同的研究领域,它们当然各自有不同的规律可循,可是,它们在同一时空的界面上的相遇和相交,就有了不同凡响的历史意

义，就有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如果以往我们对它们的研究还处于心理学上的无意后注意的层面的话，那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批学人在这个领域里所做出的努力，已经是进入了有意后注意层面了，马永强的研究也就是上升到了这一层面的成果。作为文学环境的研究，发掘现代传播对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影响与内在的互动关系，不仅成为一个新的领域，而且在学科的交叉点上会有更多的学术生长点，乃至成为一个新兴的边缘学科。

把19世纪中叶开始的现代传播作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前全球化”阶段，而把20世纪末的“全球化”指称为“后全球化”，这不仅仅是行文分期的方便，而是隐含着论者对现代文化和文学发展过程的独到识见。正如作者在《绪论》中所言：“为了将两次‘全球化’区别开来，这里引入‘前全球化’和‘后全球化’这样一个说法。前次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拓展，对于20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连网为标志的‘全球化’，只能算是一次‘前全球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追求，用殖民战争第一次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闭塞的中国也被卷入这一世界变革潮流。其次，比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农业文明，以现代化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世界性，不仅生产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而且消费也是世界的，资本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追求世界市场

的渴求。这正如阿芒·马特拉认为的那样，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全球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国富论》中提到的‘全球化’、‘宇宙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第三，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马永强的研究工作就显得十分从容与自信了。而他所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也就沿着这个轨迹迎刃而解了。

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 19 世纪中叶以降到 20 世纪“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期，这显然是马永强研究阶梯的第一阶段，后面的庞大研究计划当是他终身的学术研究目标。“清末民初现代传媒在中国的兴起，是‘前全球化’这一趋势的产物，但它提供了中外文化全面碰撞、对话的可能。本书所要探讨的正是这两种异质文化是如何在对话、碰撞中影响现代中国文学的变革，产生了新文学。现代传媒的萌芽、成长是如何形成并发挥‘公共舆论’的作用？传媒和文化‘把关人’在整个清末民初文化传播历程中处于怎样的地位？文化人士的互动对文化传播产生了哪些影响？而这些影响又如何辐射到文学变革？所以，研究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播的发展史探索其对新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在新文学的发生中寻找它的

历史渊源”。对于“前全球化”中的这些现象学、发生学的诸多问题，马永强都一一作出了严谨的论证，从中我们足可见出论者的治学态度和写作的风采。从点到面，从微观到宏观，在论者丝丝入扣的论述中，我仿佛看到了马永强孜孜以求、永不倦怠的学术面影。

马永强不是属于那种只凭天分为文的人，他以比常人多几倍的勤奋去读书，去攻克一个又一个学术难题，尤其是这五年多来，他除了吃饭和睡觉，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和学术研究上去了。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年轻人，他放弃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但是，他在做学问上决不马虎，对老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从来都是一丝不苟地去思考和理解，即使是很细微的问题也从不放过，有时连我都觉得他过于认真了。如今回想起来，也就是凭着这股永不放弃的韧性和毅力，马永强跨越了许多学术上的关隘，真正进入了学术研究的自由王国。

我常常说：有的人没有文学的灵气，搞了一辈子学术研究，但是他至死都没有真正进入文学研究的内核之中；而有的人是有文学的天分的，但是他不肯努力，不肯花大气力去啃硬骨头，也就半途而废了；只有具备了一定的天赋和灵气，又甘于坐冷板凳的人，才有可能去攀援一个又一个学术巅峰，而达到光辉的顶点。我以为马永强是属于后者那种敢于攀登险峰的学子，我也充分地相信他的能力和毅力。

作为马永强的博士生导师，我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这

个物质化世界背后拱起的年轻一代的学术脊梁，在这个浮躁的时代里看到了一线学术的希望！

是为序。

丁帆

2002年10月4日午夜于紫金山下

目 次

- [1] 文学环境研究的重要性与格局的创制(丁帆)
- [1] 绪论
- [15] 第一章 现代传媒的登场和参与
 - [17] 第一节 十字军东征的“剑”与“火”
 - [30] 第二节 现代传媒的本土化
 - [48] 第三节 出版的文化自觉与民间立场
- [64] 第二章 人的解放: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 [68] 第一节 新式学堂与人的解放
 - [83] 第二节 留学潮:文化的迁徙
 - [98] 第三节 现代知识分子的崛起
- [108] 第三章 公共舆论:文学变革的策源地
 - [110] 第一节 “公共舆论”的历史内涵
 - [116] 第二节 体制外的声音:公共舆论
 - [125] 第三节 文学变革的策源地

- [133] 第四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一：文学生态的现代变革
- [134] 第一节 文学创作者身份的普泛化
- [146] 第二节 文学传播的市场化
- [158] 第三节 阅读群体的平民化
- [168] 第五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二：
传播符号和文学话语的现代变革
- [170] 第一节 通俗化与报章文体的演变
- [181] 第二节 白话文运动的历史联系
- [194] 第三节 从文字改革到国语统一
- [202] 第六章 文化传播的效果之三：文学观念的现代性
- [203] 第一节 观念新变的精神追寻
- [209] 第二节 文学：直面现实的求变
- [227] 第三节 主潮过后的“消闲”
- [237] 第七章 文化传播的必然选择：“五四”新文学
- [240] 第一节 文学革命的现实背景
- [252] 第二节 现代性：新文学现代化的冲动
- [263] 第三节 新文学价值观的反思
- [272] 主要参考文献
- [281] 后记

緒論

相对于 20 世纪末以降的“全球化”，发生在 19 世纪中叶之后的百年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也是一次被纳入“全球化”的历程。为了将两次“全球化”区别开来，这里引入“前全球化”和“后全球化”这样一个说法。前次以大机器生产为特征的资本市场的拓展，对于 20 世纪末开始的以信息技术和互连网为标志的“全球化”，只能算是一次“前全球化”。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资本的扩张和世界市场的追求，用殖民战争第一次将整个世界紧密地联系了起来，闭塞的中国也被卷入这一世界变革潮流。其次，比起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形成的农业文明，以现代化大机器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具有明显的世界性，不仅生产受世界市场的影响，而且消费也是世界的，资本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追求世界市场的渴求。这正如阿芒·马特拉认为的那样，从亚当·斯密开始就“将全球视为一个市场、一个工厂、一个车间”，《国富论》中提到的“全球化”、“宇宙

化”，就是“通过市场建立一个全球化的共用空间”^①。第三，这一全球化的进程是与现代传播系统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比如，铅字印刷技术和大机器化的采用、普及，电报、电话等现代通讯技术的发明、应用，横跨大西洋的海底通信电缆的成功铺设等等，都为“前全球化”提供了一种技术和信息支持。

从此，人类文明的制导系统发生了变革，现代传播开始参与历史进程的建构。

在无法回避的“前全球化”的冲击下，机遇和危机同时走向古老的中国。

1840年，随着西方列强殖民主义的枪炮轰，自清初开始封禁的锁国大门在紧闭了二百多年后终于被迫打开。家国一体的正统秩序，泱泱大国的威仪、自尊，锁国闭关的安宁与平静，这一切似乎合法的运行轨迹在突如其来地打击下崩裂、走样，整个民族赖以维系的命运支点蓦然间粉碎了、消失了。从此，一个有着五千年辉煌文明的古国便踏上了动荡、屈辱、戒备、迷惘的求索之路。

“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②。这描述的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社会的现实状态。

痛楚与困惑的选择是无奈的，但谁让我们不早一点觉醒、自强呢？“日之将夕，悲风骤至”，早在1815年，时代的预言家龚自珍就对封建衰世的命运发出警示。在《尊隐》篇中，他对比描述了“京师”和“山中”的景象。那“荣华富贵的最后一代”

① [法]阿芒·马特拉著，陈卫星译：《马特拉的词与物》，《世界主义与文化霸权（代译序）》，第9~10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② 许纪霖：《无穷的困惑》，第1页，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和“受苦受难的最后一代”^①，就是对封建末世命运的宣言。作为封建专制集团的一分子，他想唤醒昏昏然的当政者，奋发图强，以避免衰亡的命运；作为主流话语圈的边缘人，他抨击时政，呼唤风雷，渴望革新力量的崛起，并将希望寄托在“山中”世界。他相信“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②。可悲的是，清醒者的呐喊被暗夜里的鼾声淹没，抑郁不得志的龚氏不得不道出最后的忧思：“起视其世，乱亦竟不远矣。”^③

历史的发展，不幸被龚自珍言中。

—

面对突如其来的殖民战争，自大、麻木的政治集团束手无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软弱和无奈，但其灵魂仍然沉浸在天朝威仪的亢奋中。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后，统治者心态依然陷于“夏”“夷”的臆想构架，整个民族仍然缺乏深刻的反省和检讨，这不能不说是一场更大的悲剧。因此，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域外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最初见面和碰撞，只能是浅层次的、表面化的，它无法给病人膏肓的中华民族带来深刻的震撼和警醒。从林则徐的“睁眼看世界”到洋务运动，中

^① 王俊义、曲弘梅编：《龚自珍魏源诗文选译》，第70页，巴蜀书社，1997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② 龚自珍：《尊隐》，《龚自珍全集》上册，第87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以下引据本书版本同。

^③ 龚自珍：《乙丙之际著议第九》，《龚自珍全集》上册，第7页。